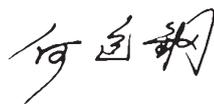


# 從「內外一體」看中國政治改革



明末大儒王船山(王夫之)從天理、人情、事勢討論朝代興亡的規律，提出「天下之大防二：中國、夷狄也，君子、小人也」的「內外分殊」觀點，而今天我們有必要放棄「內外分殊」，從「內外一體」的視野探討二十一世紀國運興亡之學。

中國在當代的崛起面臨着是否會中斷或下滑、能否成為持續崛起的強國之擔憂。英美兩國崛起和稱霸的時間、幅度都是超過一個世紀的，近代德國和日本的崛起則都是短命夭折。中國政治制度能否為跨世紀的崛起提供平台和保障？本文旨在回答這個重大的時代課題。為此，我先從世界觀和方法論入門，探討從內外分殊到內外一體的變遷，然後從內外一體的新視角，捕捉一系列內外關係所產生的矛盾，並從歷史經驗的視角討論政治改革的不徹底如何限制了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引導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詳細討論了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特性如何影響其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中國的權力運作和管理方式何以不能適應內外一體的新形勢，並且加深、擴大了內外糾纏所產生的一系列矛盾，由此限制和約束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不僅阻礙了中國發展和加強貫徹中央戰略的能力，更影響了中國自身戰略的制訂和調整。

本文的資料來自於我近十年的田野調查，跟蹤、了解中國「一帶一路」在各國的進程及其社會各界的回應<sup>①</sup>。過去十年，我在澳洲迪肯大學開「中國與世界」的碩士課，每年近五十個學生，一半來自亞洲和非洲諸國，學生每周的報告使我受益匪淺，從而了解各國對中國的態度和回應。每年我大約回國十次左右，這些經歷有利於我反思內外一體的新現象和新理論。

## 一 從「內外分殊」到「內外一體」

中國具有悠久的內外分殊的理論和實踐：王船山的歷史哲學強調夏夷之分，「夏」代表中華文明的核心，「夷」指外部「文之不備，漸至於無文」的野蠻人。清末官員張之洞又提出體用之分，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 筆者感謝吳進進、王植、唐麗欣、黃嘉嘉協助文字整理。

在當代中國，內外分殊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海外關係的人常遭受到「裏通外國」的猜疑，是一個政治負擔，但是到了1980年代，海外關係變成一種資源和一個優勢。80至90年代，國內每逢有重大政治人事政策變動，總是先在香港報刊上「透風」，讓信息中轉回到中國大陸看看反應。

中國至今仍然實行「內緊外鬆」政策，內外有序，分別管理。但今天的內外分殊已經喪失了王船山的道德含義，而是顯現和突出了主權意義，從主權和國疆來定義內外，由此建立一種內緊外鬆的治理方略。特別是台灣和南海問題：在中國政府看來，台灣主權屬中國，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而南海爭端的聲索國是隸屬區域內部的國家，美國被看成是「域外國家」。2020至2022年在管理新冠流行病上，中國對內嚴控流動、對外宣傳防疫，可是新冠病毒並不理睬人為的內外區別政策，在全球擴散期間又回到了中國。最終在新冠病毒的長期流行下，中國政府根據形勢發展做了調整，在病毒效力已經普遍減弱的情況下，放棄了「動態清零」政策。

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從各方面打破了過去內外分殊的理念，嘗試建立新的內外一體的認知。清末學者魏源超越了「大陸為內、海洋為外」的陳舊觀念，主張建立一個內外貫通的海洋大國<sup>②</sup>。毛澤東在思想上摒棄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倡導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打破內外分殊的另一舉措是，早在60年代就想把中國打造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者。進入二十一世紀，趙汀陽的「天下說」再次打破內外殊別，建立了一個新的內外一體的宏觀學說<sup>③</sup>。2022年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中，把「中國式現代化」界定為「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也提倡世界現代化，通過和平發展道路，有機地把中國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結合一起，是內外一體的一個生動體現和表述<sup>④</sup>。特別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強調：「我們要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sup>⑤</sup>

本文把「內外一體」的概念上升為一種方法和理論或一種思想框架。這種理論和方法不只是單從中國看世界，或者是單從外部世界看中國，而是從內外一體的視角看中國與世界。「內外一體」是一種理論框架，強調內中有外、外中有內，內外共存，內外糾纏、互動，相互依賴，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該框架是一種整體論觀點：「內部」被理解為始終包含外部世界的成份、記憶和痕迹；內部絕不是單獨存在的，它不能與外部世界分開，因為外部世界早已在內部存在着。內外關係「隱纏」在一體化的國際關係中，內外共存並作為一個整體；整體和部分不可分割。從這種世界觀來看，強調部分的特殊性來否定整體性的觀點是不對的，完全忽視部分的特殊性同樣也是有問題的；內外一體應有一個統一的原則。

內外一體的視角描述了從外到內的捲入活動和從內到外的展出活動，兩者構成了一個動態的、不均衡的完整運動。從外到內的捲入活動是注重觀察中國內部政治如何捲入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中，導致外部世界向內摺疊，並出現了一種隱性的內外糾纏秩序，可稱之為「隱纏序」。這種隱纏序到底如何重新構造中國政治秩序，有待於我們去發現。從內到外的展出活動是描述中

國內部政治如何影響了外部世界，展出了一種「顯析序」<sup>⑥</sup>。下一節我將專門闡述這種顯析序：一系列內外交織和滲透所產生的可觀察到的矛盾。

從內外分殊到內外一體，涉及到內外的上下關係的變化。古代中國內外分殊的背後是一種上下有等級的權力關係：內是上，外是下，「上」要統治「下」，「外」必須服務「內」。朝貢制度的實質在於「外邦」必須接受「皇上」的冊封。其時中國文明發展模式是同心圓擴大模式，只承認一個發展中心，而這個「同心」是在權力等級制度下推行的。當中國從內外分殊轉變為內外一體時，權力等級關係也在悄悄地被削弱，呈現為一種網狀的平等關係。理想的內外一體的權力關係應該是平等、互助、互利的，中國早在19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互相尊重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就體現了這種新型國家間關係。目前中國正在通過「一帶一路」編寫一部開放系統的二十一世紀的新版「大百科全書」，它將描述內外一體所呈現的一種網狀的平等關係，對自由和理性的探討應是這部大百科全書的內驅力。

## 二 內外糾纏的矛盾

中國崛起及其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和影響已經悄悄地改變了內外關係，但是現有的政治體制和管理方法仍然基於內緊外鬆、內外有別的傳統原則，各種行為和思維方式仍然是內外分殊。當代國際關係的現狀和趨勢與傳統中國權力文化發生了直接的衝突。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是複雜的、相互依賴的，不同於古代世界從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在現有國際組織中，當一個大國提出某個議題，往往引起一系列猜疑，遭到消極或主動的抵制；中小國的提議又會削弱國際關係中的等級性。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各種議程和議題明顯地缺乏等級性<sup>⑦</sup>。可是中國仍然習慣於從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熱衷於大國倡議：2021年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2023年又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這些倡議都切中世局時弊，提供了明確的解決方案；但是由中國倡議，然後召開一系列國際會議來貫徹落實，這一做法必然會遇到抵抗和批評，違反上述國際政治規律，成功率較低<sup>⑧</sup>。

首先，中國企業內部管理體制與海外市場的發展發生了深刻的內在矛盾。國內體制強調黨的絕對權威性，由黨領導一切；在特殊時期，強調黨的權威是有其道理。但是，當黨控制了國有企業，甚至私人企業也被要求建立黨組織時，這必然涉及到黨是否掌控企業數據。這樣，中國企業在海外擴張、發展時，黨控企業所引發的數據安全問題，必然被海外各種力量利用，來抵制和限制中國公司在海外市場的發展。中國政府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目前正在學習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管理模式來減輕或淡化中國企業管理中這個內外糾纏的矛盾。

其次，在貫徹「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中國還面臨着與主權相關的內外矛盾。中國各省市或企業一方面會把某個小國當成中國的一個省或市來看待，與該國直接簽訂各種計劃意向書；另一方面又不把該國當成國內省市來

思考長期的發展戰略。以所羅門群島為例，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的貿易主要集中在購買木材，佔該國90%的木材出口總量。等到2037年，該國木材開發完畢，下一步如何發展經濟，似乎不是中國需考慮的事情。一旦中國忽略了這個重大問題，隨着該國內部政治的變化，它必定會在選舉時成為一個定時炸彈，減低中國在所羅門群島的政治影響。在肯尼亞，中國的「洋貨」湧進了該國，削弱了當地的本土經濟。中國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島國的「一帶一路」項目，目前正在經受摩擦期的考驗。中國不能只把某國當成原材料的供應方和一個新市場的購買方，必須解決、保障和發展該國的民族工業，由此必須進行技術轉讓，讓其發展出可賺取外匯的加工業。而一旦如此，中國又必須保證自己技術的領先地位。習近平主席已看到這些問題，在2023年3月13日講話中專門強調：「我們要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即用好全球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又推動世界共同發展。」<sup>⑨</sup>

再次，國內意識形態的高度控制與中國在世界中的領導地位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和矛盾。自然，中國是一個嚴重缺少共識的社會，在現階段用強制性的意識形態控制來凝聚共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鄧小平的不爭論以及四項基本原則的目的正是這樣，通過強制建立共識。而且當下的這種強化控制與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有重要關係。但是，中國對媒體、微信的嚴格控制，不利於中國在世界上「講好中國故事」。控制得愈嚴格，「講好中國故事」的效果就愈減弱。為了國內政治的需要，拼命宣傳某個價值、理念、精神，就可能愈來愈多地引起國際社會中的猜疑和抵抗。意識形態工作要把內外打通，要推動國際化和全球化，就必須改變過去簡單的由上而下的超強控制方法。簡單的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工作方法不利於發展內外一體的新局面和新政策。高度控制影響了正常的中外信息溝通，造成了信息封閉。例如，中國對太平洋島國的援助數據當屬中國最全，如能公開發表，應該最有權威性。可是，即使中國學者寫這個課題的文章，還得依賴於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在網上公開的資料<sup>⑩</sup>。信息不全、單方渠道傳遞會導致政策失誤。

最後，內外糾纏的矛盾關係深入地體現在個人行為和思維中。國內不少國際關係學者一談到中國政治就表現出深度擔憂，對其高度控制頗有微言，但是一談到對外政策，民族主義思維馬上佔上風，可以容忍、接受管控的做法。這樣就妨礙了批評性思維的發展。國內的國際關係學者應該擁有較多經驗和素材，最先看到政改的不徹底如何限制了中國全球領導的發揮，但是我們很少看到這方面的著作。他們要在政治高控的壓力和民族主義之間尋找平衡，採用兩套敘事和兩套價值標準來思考。下面，我將通過案例進一步討論這些矛盾及其影響。

### 三 政改的不徹底和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四十五年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政改不徹底，繼承政治規則的變更、民主制度建設仍然停留在口號式的階段中。中國在2019年提出

人民廣泛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理想構建，但這不是實然狀態。這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想模式與現實內外政治嚴重脫節，不能解決下面所提到的國家權力的約束和權力運作問題。

最近十幾年，不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視中國為天然的領導和世界權力的中心。它們要發展經濟，減輕來自西方國家的人權壓力，所以就大力支持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所倡議的「發展權」。中國的三次人權提議都得到半數以上票數的支持，獲得通過。特別是2018年，美國被徹底孤立，只有美國一方投了反對票<sup>⑩</sup>。這大大增強了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認為這說明了中國現有體制的優勢和吸引力。這樣就使中國忽略了政改的迫切性，也忽視了政改不徹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下面我將從權力之源、權力制約和權力運作三方面來論證政改的不徹底使得中國的全球領導意圖落不到實處。

### (一) 政治價值和制度如何限制中國戰略意圖的實施？

從權力之源的視角來看，對民主和人權等政治價值和制度的理解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可是，中國在根本政治價值上與歐洲、澳洲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妨礙了中國戰略意圖的實施。以中歐戰略合作來看，當時任美國總統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3年不顧一些歐洲國家的反對，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時，歐盟就把中國視為天然的戰略夥伴，以應對美國單方面的霸權主義，由此中歐雙方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sup>⑪</sup>。當2017年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單方面繞開WTO的仲裁機構，對中國、印度和歐盟實施各種制裁，推動單邊主義時，歐盟再度視中國為戰略夥伴，加強雙方的經貿關係，並在2020年簽訂了《中歐全面投資協議》。在應對美國挑戰時，中國也自然地要和歐盟合作，加強戰略夥伴關係。但是上述兩次中歐戰略合作都由於各種原因被中止。除了地緣政治和美國政策的調整之外，政治價值上的衝突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以《中歐全面投資協議》為例，當歐盟對中國新疆人權狀態表示不滿並實施制裁時，中國也對一些歐洲議員實施反制裁措施作為回應。歐盟議會在2021年9月通過的〈歐盟對華戰略〉(“A New EU-China Strategy”)中強調，批准投資協議的前提是中國撤銷對其議員的制裁，否則議會就不會討論此事，更不用說通過了<sup>⑫</sup>。

另一個例子是中澳關係。特朗普上任後的不同舉措對美澳關係造成巨大衝擊，原本如磐石之固的美澳同盟關係出現了裂縫，特別是2017年2月1日他與時任澳洲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原本計劃通話一小時，特朗普只談了二十五分鐘就掛上了電話。此事進一步引發了澳洲社會各方人士對澳美同盟政治的全新思考，「美國靠不住」這種想法開始萌芽，擴散到社會各個層面，特別是在教育界。

在2017年筆者就碰到了下述三事，很生動地反映了澳洲各界人士對美澳同盟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某大學校長與我談及國際大事時說：「中國是澳洲必須選擇的戰略夥伴。美國是靠不住的。儘管印度奉行民主制度，

政治文化與澳洲相近，但是印度的地位和實力遠遠比不上中國。」第二，澳洲國立大學教授懷特 (Hugh White) 公開撰文並在公開演講中說：澳洲正碰到百年未遇的挑戰；澳洲一直假定美國是堅定的盟友，在最危險的時候，美國可以幫助或挽救澳洲。但是懷特認為，這個假定已經不可靠了，澳洲必須選擇在沒有美國的條件下與中國打交道的戰略和計劃；這意味着，澳洲外交政策需要一個「革命」（即「一套全新的外交技巧」）；雖然這將是極不愉快的過程，但是澳洲必須完成這個「革命」<sup>⑭</sup>。第三，特別使人驚訝的是，我兒子就讀的中學衛理學院 (Wesley College，曾出過兩個澳洲總理) 組織了一場辯論會，讓學生公開討論澳美同盟的優點和缺點，以及其體系能否長久持續的問題。前幾年，當我讀到一個澳洲碩士生寫的論文中尖銳地批評澳美同盟政治時，曾經驚訝不已。現在，對同盟政治的懷疑和批評已進入中學生的視野中了。澳洲社會對美澳同盟取態的變化可由民調結果來佐證。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年度民調反映了2015至2017年間的變化：2015年高達80%的受訪者認為要保留和支持澳美同盟體系，它對澳洲安全「相當」(very) 或「相對而言」(fairly) 重要。2016年民調顯示出這個比例急速下降到71%；相反，有45%的受訪者認為如果特朗普當上總統，澳洲應該與美國保持距離。2017年民調又有反彈，將近77%的受訪者認為同盟對澳洲安全「相當」或「相對而言」重要，僅29%的受訪者認為需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保持距離<sup>⑮</sup>。

澳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在國家安全上不再依賴英國而轉向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的新形勢對一個國家安全政策的改變，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目前澳洲這場「靜悄悄的革命」似乎中止了（這個中止是暫時現象，還是有可能再繼續發展，還視乎未來中澳雙方關係的發展）。地緣政治、美國的壓力、台海戰爭的潛在威脅，都重新加強了澳洲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合作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澳美的同盟政治是建立在民主價值上的。當中國政治遠離民主價值並呈現更多的威權主義因素時，這種政治價值的差別和對立就被地緣政治放大了。中國在政改上的不徹底強化了政治價值衝突，澳洲朝野上下都在擔憂中國政治的走向，擔憂一個不受權力約束的政府會給澳洲政治、經濟帶來危害。兩相比較，當2000年代初中國政府推動鄉村選舉，特別在2004至2005年力推地方協商民主時，這為澳洲調整其安全政策提供了有利條件。2007年陸克文 (Kevin Rudd) 當選為總理，立刻宣布澳洲退出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 機制。除了其他各種因素之外，中國基層政治的改革削弱了反對中國的各種理由，擴大了陸克文調整安全政策的空間。當下中國政治愈來愈朝威權主義方向發展，因此同盟政治的民主價值進一步激活。美澳共同強調捍衛民主價值，以此來證明鞏固和發展同盟體系的合理性。可見，中國政改的不徹底被西方國家利用，成為加強同盟體系的強有力的理據之一。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光談「中國政治特殊性」及「雙方都得尊重不同政治價值」，是無濟於事的。中國政改的不徹底、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的倒退，在在拉開了中歐和中澳戰略合作關係的距離。自然，我們應該指出「民主對抗威權」的理論模式也有各種問題<sup>⑯</sup>。

## (二) 政治體制如何阻礙中國參與地區主義？

下面我先談地區主義 (Regionalism) 在中國對抗美國中的戰略價值，並討論現有權力制約機制束縛了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二十世紀地區主義的崛起代表着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個新階段，它是構建地區秩序的一種新的力量和方式，同時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一個新的工具。二戰結束以來，美蘇爭霸使得地區主義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得到了發展，美國通過支持歐盟和東盟的成立與發展以對付蘇聯。再到當下，美國非常重視東盟，2022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 在華盛頓召開了美國—東盟峰會；2023年7月，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參加美國—東盟峰會，再次利用地區主義來應付中國的挑戰。

地區主義不同於同盟政治。歐盟和東盟的成立與發展則暗示了一種新的地區秩序的構建方式，它依靠新興的地區組織，是通過制度建設和共享共治原則來構建地區秩序的努力。這種地區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理念，但是目前從大國主導的秩序過渡到地區組織建構的秩序非常困難，因為前者不願意退出，所以形成了兩者並存的現象。

對地區主義的重視是中國應對美國圍堵政策 (containment) 的一個突圍戰略。當東盟在中美戰略衝突中保持中立，地區主義就是一種戰略緩衝器，更是削弱、分化同盟政治的一種方法和手段。美國同盟政治的盟友，如澳洲、日本、韓國都是亞洲地區組織的成員國，這就使得同盟關係中的敵友概念無法適用，由此就削弱了同盟政治的敵友邏輯。美國從歐盟發展中得到的教訓是，不希望亞洲地區主義來約束其霸權，因此美國在亞洲總是強調同盟政治。非常幸運的是，地區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新的戰略選擇：中國可通過發展複合、多種且重疊的地區組織來緩和地緣政治的爭鬥，不必建立一個反美同盟，從而避免了冷戰中兩個軍事集團的對立<sup>⑩</sup>。

美國在亞洲的地區秩序構建上，基本上實施以傳統的軍事同盟為主，地區主義為次的戰略。美國戰略上的最大短板在於不敢徹底支持地區主義，美國在推進亞洲地區主義上是一個「錯位國家」，因為美國並非是一個亞洲本土國家，而是天然的「域外國家」。美國鑒於其霸主地位老是排斥地區主義，往往只會被動地接受之。相反，中國處於亞洲，無論哪種地區主義都得把中國當成天然的成員，崛起的中國可與地區主義的發展兼容。守成的霸權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競爭的關鍵，就在於哪一方能夠作出妥協，調控矛盾，哪一方能在共享共治原則上進行創新，由此倒逼國內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配合。崛起大國的戰略往往就是通過地區主義為自己尋求最好的戰略空間，即使自身在這個過程中受到約束，但這個代價必須付出。成功的地區主義都是在共享共治領導體制下建立的，如歐盟的成功依賴於德國和法國的共同領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依靠日本和澳洲的共同領導。

在南海問題上，管控南海的安全機制的建立，最終還是靠中國和東盟的共同領導。2002年東盟和中國簽訂了《南海共同行為宣言》，但是缺乏嚴格的約束條款，菲律賓、越南、中國後來都有填海建島。如何吸取歷史上的教訓，

落實和貫徹行為規則，使規則運轉起來，是中國在地區主義上的首要任務。發展地區主義勢必涉及到國家之間的權力制約機制，若要將南海行為準則打造為一種符合地區主義的國際法規則，意味着對中國權力的限制也包括對他國權力的限制，對各方權力的限制。如果中國通過地區安全組織（即東盟加中國的安全對話論壇）來管控南海爭端，這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體現和驗證，更是解決和調控南海爭端的定海神針。但是這就碰到國內強調中央集權、權力不受制度性約束的政治體制問題。中國能否接受地區組織發展對其權力的約束？

南海行為準則應該是一個包括仲裁機制的安全機制。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曾與我在2019年12月6日於海口有一次深度交流。他認為：該準則應包括懲罰條款，設立秘書處，具有共同約束力；為了強化共同約束力，中國應從國務院行政審批程序過渡到人大常委會立法審批程序；中國必須接受有約束力的準則，否則就是白幹。吳士存在一篇文章中強調，「如聲索國都能以『主張海域最小化、合作海域最大化』的新思路、新姿態回到談判桌前，那我們離南海問題最終解決……就不遠了」<sup>⑧</sup>。這裏他強調爭議各方管轄權最小化，合作最大化：大家都退一下，大國應首先退一步，再鼓勵小國退一步。

地區主義的發展必然涉及到如何處理民族主義的問題。在南海問題上，國內民族主義仍佔上風，如退讓幾個小島，就會引起「憤青」的反對。但是狹義的、偏激的民族主義不利於解決南海問題，因為這些意見只訴諸軍事手段，只講自己的國家利益，不關注其他聲索國的利益，必然導致排他性的思維。一旦各國都講自己的民族主義，其邏輯必定是「這是我的主權，主權必須用武力來捍衛」；一旦爭議國都持相同的觀點，以及各種條件成熟，戰爭就成為唯一選擇。

美國的介入是一個新的挑戰，也許南海在地區主義方面必須發展出一種東盟和中美雙方協商來管控衝突的模式。中美軍艦在南海海洋上相互挑戰對方的做法，不如雙方在地區組織上「爭吵」更安全。從古至今，國外介入是一種常態，只用「域外國家」的思路拒絕美國的介入和參與，並沒有看到新事實：幾個南海聲索國主動要求美國介入。內外一體的視角需要區分不同類型的外部力量、不同方式和程度的介入，這才是在新時代下符合現實主義的方法論。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也必須重新思考「域外國家」：有不同性質和類型的「域外國家」，其介入的程度和方法應該是不同的，簡單地以「域外國家」排斥之，也不利於發展出解決和管控南海爭端的機制；更為重要的是，所謂的「域外」其實是內外一體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前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在2016年10月香山論壇上建議，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應建立多邊的地區組織，這比強硬的民族主義式回應可帶來更好的和平效應。霍克主張由中國主導，但是不排斥美國等「非聲索國」<sup>⑨</sup>。按照霍克的構想，也許美國能夠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最終在落實行為規則上成為主要的監督方，以保證行為規則的落實。這需要大國智慧來把此事做成。中國向美國提倡「新型大國關係」的一個突破點可能就是，中國能否邀請美國成為東盟和中國的安全對話論壇的觀察方<sup>⑩</sup>。

中國正從大陸性權力轉化為新興的海洋性權力，由此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挑戰：不只是通過發展海軍來稱霸海洋，更是通過地區主義來解決海域爭端。海軍發展只是一個輔助工具、一個安全保證的力量。中國要在南海發展出一種地區主義，就需要把南海看成是一塊試驗田，創造出一種新型的和平機制。歷史上多瑙河曾是歐洲戰爭之源，二戰後經過各方努力，建立了一個多國參加的地區治理機制，使之成為和平之河。

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中國最終還是必須建立自己的同盟體系，因為在最關鍵的主權問題上，最終還是靠戰爭；地區主義無法解決主權問題，不能解決傳統安全問題，不能強化主權；而且在域外力量的干預下，發展地區主義更具難度；中國剛建立了一個以主權為基礎的現代國家，難以採納後現代國家對主權靈活處理的方法和措施<sup>②</sup>。但是上述看法未能看到，雖然地區主義約束了大國的權力，但是它也擴大和增強大國的軟實力，是一種權力放大器，對主權的靈活處理正是擴權、規範權力的一種現代化處理方法。地區主義是一種追求新的地區秩序的方法，如能成功管控南海爭議，戰爭就不是一個選項。德國成功地運用地區主義戰略約束了其權力，消除戰後各國對「德國化」的恐懼，成為歐洲諸國中的大國，領導了歐盟的發展<sup>③</sup>。這是中國發展地區主義可以學習的一個經典模範。中國如能把南海行為準則打造為一個制約其權力的機制、一個憑藉和平協議而建立的規則，這就可打造成類似德國經驗而高於德國經驗的「中國模式」。

### (三) 中國權力運作如何影響「一帶一路」的實施和進度？

中國權力運作仍然是內部操作，存在着一系列的問題，如政治不透明、重視上層精英，特別是注重形象工程和熱衷於簽訂意見書，「說得多，做得少」的事常常發生。孟加拉接待了許多中國代表團，甚至是七百人以上的代表團，簽署了各種非正式的意見書，但是真正落實的極少，大部分只停留在概念層面上。中國在斐濟也簽訂了上百份合作意見書，落實的只是在個位數。意大利也有類似的經歷，以致新選出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要退出「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轉向加強與印度的合作。

中國權力運作方式影響了「中國模式」在世界上的推廣。緬甸民選議員被邀請到中國參觀訪問，發現緬甸的少數民族比中國的少數民族享有更多的自治權，由此懷疑中國民族自治模式輸入到緬甸的可能性。巴基斯坦《南亞》(SouthEast) 雜誌專門組織專刊，討論一黨模式應用於南亞，以解決多如牛馬的政黨帶來政局不穩定的問題，可是一旦涉及到中共如何實現一黨模式時，當地時事評論者發現這個一黨模式與巴基斯坦的歷史、文化傳統相衝突<sup>④</sup>。斯里蘭卡的記者在北京接受培訓時，雖看到中國新聞業的統一性和紀律性，但是他們天然地感到能在自己的祖國享受更多的自由，由此懷疑「中國模式」在斯里蘭卡推廣的可能性。

中國權力文化強調權柄不可授人，政治透明不利於抓權和鞏固權力，黑箱操作和政治不透明應運而生。中國與巴基斯坦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屬國

家機密，對外不公開。澳洲維多利亞州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訂了「一帶一路」的意向書，但是這份意向書不向外公開，遭到廣泛的批評和質疑。

權力不透明下的運作必然產生腐敗。「一帶一路」項目中腐敗問題層出不窮。前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 (Mattala Rajapaksa) 任內要求中方在其家鄉城市興建機場，前馬來西亞總理納吉 (Najib Razak) 據稱接受了中國的鉅款<sup>24</sup>。這種權力腐敗必然遭到廣泛的抵制。權力運作在內外一體的關係中應該是透明的，一旦人們可以觀察到權力如何運作 (如意向書的內容是甚麼、是如何簽訂的)，人們就會誠服，才能夠釋除疑慮，增強權力合法性。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幾年後，一些受援國出現了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受援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了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但在社會上出現了反對的聲音。反對派政黨抓住「一帶一路」中的問題，引發民眾抵抗的情緒，並將其放大為一個選舉問題，藉此在選舉中獲勝。2018年馬爾代夫的薩利赫 (Ibrahim Mohamed Solih)、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 (Mahathir Mohamad) 和巴基斯坦的伊姆蘭·汗 (Imran Khan)，2022年肯尼亞的魯托 (William Ruto) 和斐濟的蘭布卡 (Sitiveni Rabuka) 都在質疑和批評「一帶一路」中當選最高領導人。馬爾代夫新任總統薩利赫要對中國項目重新作出審核；由「一帶一路」倡議協助融資的巴基斯坦「橙線」(Orange Line) 地鐵項目暫停興建；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臨時取消中資的「東海岸銜接鐵路」項目，最終縮減了項目規模；斐濟總理蘭布卡終止了與中國簽訂的警察培訓協議。即使在政府沒有更替的情況下，民眾壓力仍然影響了政府的政策。2017年底，尼泊爾和緬甸都取消或擱置了「一帶一路」中的主要水電項目。因此，在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中國面臨着一個新的挑戰：如何應對地方性的抵抗？中國在應對國內地方性突發事件中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這些基於國內的經驗未必能運用到他國中，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應對方法和策略。

中國「一帶一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基建項目。然而，這一種模式依賴於龐大的勞動力、繁多的建築材料、巨大的資本和大量的土地空間，這四個方面都是產生內外糾纏之矛盾的根源。目前國內一些學者把地方抵抗歸咎於美國在背後搗亂。「一帶一路」確實已成為中美地緣政治中的一大問題，但更為關鍵的是，任何出口基建都難免會遇到地方的抵抗。日本在1980至90年代於東南亞國家的基建就遇到了抵抗。目前中國出口基建在規模上遠遠超過了日本，在下述勞動力、材料、資本和土地這四個關鍵領域，會遇到更強大的阻力。

大規模的「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可以在受援國產生許多直接的本地工作機會。然而，中國企業往往傾向於使用中國工人而不是當地僱員來完成大量工作。比如，2015和2016年中國海外建築工程分別僱用了72.9萬和70萬中國工人，同時僱用了約60至70萬本地工人<sup>25</sup>。利用當地勞動力會在職業培訓與解決語言和文化差異等方面增加成本，而僱用中國工人可以減少成本並提高效率。然而，對於「一帶一路」的受援國而言，這種傾向於僱用中國工人的做法引發了當地人的不滿。對此，老撾和土庫曼斯坦等國的反華情緒有所上升，

越南和斯里蘭卡也發生了公開示威活動。目前不少受援國政府加強了政治監管，實施當地勞動力配額和限制外國工人人數等制度。例如，土庫曼斯坦規定，項目中必須有至少70%的勞動力是當地的；而烏茲別克斯坦則限制中國公司僱用低於管理層的中國工人<sup>26</sup>。

在建築材料上，2011至2013年的三年中，中國使用的水泥相當於美國在整個二十世紀所使用的水泥總量。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間，中國鋼鐵生產數量相當於世界鋼鐵生產數量的總和。隨着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新常態」，「一帶一路」為中國提供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新途徑，不僅促進了工業材料的出口，而且提高了實際的生產能力。中國建材集團在2017年透露，計劃到2020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建立一百家海外工廠企業。然而，中國原材料的輸出和受援國原材料生產的外包，會使受援國的當地產業邊緣化。我在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採訪時，一些小型工廠的老闆表達過這種擔憂：中國的鋼鐵比馬來西亞生產的鋼鐵要便宜一半，中國廉價的電子產品使巴基斯坦本地類似產業無法生存。

基建項目需要大筆資金，通常涉及數十億美元以上。鑒於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資金缺少的問題，加上許多國家希望避免西方融資的政治條件，尋求中國投資，這為中國資本跨國化提供了良機。然而，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地方阻力。中國和受援國的財富與權力的不對稱性反映在公司與公司的關係中。隨着中國國企與當地商業階層、政治精英和受援國的軍方發展深入的合作關係，裙帶資本主義和大規模腐敗現象增加。這是當地抵抗的驅動因素。2017年9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世界銀行聯合舉行了一次題為「加強國際合作共建廉潔之路」的研討會。中國還在2018年宣布成立國家監督委員會，這個反貪機構對所有在海外經營的國企和政府部門擁有管轄權，意味着像中巴經濟走廊這樣的「一帶一路」項目自動落在其職權範圍內。

大部分的「一帶一路」項目通常要使用大規模的土地，如修建一條鐵路涉及到上千公里的沿線土地。可是外國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微妙、敏感的話題。中國企業一旦擁有鐵路建設中某些土地的使用權，就可能引起當地民眾的反感，並上升為後殖民主義的話題。中國的基建項目中使用大規模的土地，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居民的搬遷和生計改變，而一旦當地政府貪污中國政府或企業的補償金時，地方的抗爭就層出不窮。

在勞動力、材料、資本和土地這四個關鍵領域產生的問題，將進一步轉化為三個內外糾纏的問題：對主權的敏感、經濟發展的多元中心，以及中國是否和如何調整對外不干預原則。下面我將以孟加拉為個案，深入討論這三個問題。

2016年4月10至14日在孟加拉駐新加坡大使的幫助下，我專為「一帶一路」的問題拜訪孟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及其東亞事務辦公室、孟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和二所著名大學的國際問題專家。我在第一天拜訪了負責東亞事務的外交官員，他們一開口就大談主權問題，這使我大為驚訝。首先，他們認為，中國的金融貸款為孟國提供了另一個渠道，為此不必過多地依賴美國領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因此可以捍衛其在經濟決策中的國家主權。但是他們擔憂中國

政府主導的經濟項目，比如鐵路建設：一般的看法是鐵路建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極佳的機會，是千載難逢的大好事，但是從安全的角度來看，外國建設甚至管理本國鐵路恰恰成為了一個問題、一個負擔、一個衝突的根源。泰國有學者擔心鐵路的貫通為未來中國運輸軍力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國內學者如王清華和楊思靈曾建議，雲南要推動「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戰略<sup>27</sup>。孟國政府官員接受了許多來自昆明的地方官員的訪問，可是他們認為，孟國與昆明的對話是國家與地方政府的對話，特別是與其簽訂的協議是非對等的。這種對等性考慮的背後，傳達了他們對主權的擔憂，他們認為在與中國地方政府打交道時，孟國的平等主權地位下降了。當然，上述看法未必正確，但這是中國不得不考慮的一個敏感問題，即是前面談到的主權下內外糾纏的問題。

與主權相關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多元中心問題。前面講到內外分殊中國文明的同心圓擴大模式，這種觀點仍然存在，而在內外一體的世界中，主導內外關係的是網絡式，有多個中心。不少中國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將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說法引起印度和孟加拉的擔憂。正因如此，印度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提出自己的方案，如「香料之路」(spice route)，可見印度也想建立在南亞的中心地位。孟國官員談到，雖然該國也希望在「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從各國利益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必須與他國的計劃相容互補，「一帶一路」的成功應該在於促進世界經濟多元中心的發展；只談中國，只說中國是世界經濟中心，只會在經濟發展中樹敵過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一位孟國高級外交官員說，少談中國的「一帶一路」，多提世界的「一帶一路」，這樣才可以清除計劃實施中的障礙。他還認為，中國的策略應該是：「你」(本國)有一個道路建築方案，「我們」(中國)會加入，這是「你」的計劃；「我們」幫助「你」來實施它。這種策略把中國的「一帶一路」變成屬於他國的、雙方共享的計劃，從而形成雙贏。2023年「全球化智庫」課題組主張建立「一帶一路」多邊合作中心、「一帶一路」多邊指導委員會或國際顧問委員會<sup>28</sup>，可見中國政策研究機構已經在這方面邁進。

最後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國如何調整過去外交不干預的原則和方針。對於這個問題，孟加拉方面曾向我主動提出。2017年10月28日，孟加拉民族主義黨副主席拉赫曼(Tarique Rahman)及其國際部負責人在倫敦西區的「瓦倫之家」(Warren House)與我交談時，提出了一個關於內外糾纏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工程在孟國受阻，原因與孟國的國內政治有關。2014年，在孟國幾大主要反對黨拒絕參加不公正選舉的情況下，哈西娜(Sheikh Hasina)領導的孟加拉人民聯盟獲選，其中154個席位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獲得。選舉前後，美國、歐盟、聯合國都批評了孟國選舉的不公正性，美國甚至考慮不承認哈西娜政府。唯有印度公開支持哈西娜政府，因為哈西娜採取親印政策，在當地的港口和基建問題上首先考慮印度政府的意圖和政策偏好。

拉赫曼呼籲中國直接干預孟加拉的選舉，認為孟國的選舉給中國帶來極佳的機會，從而扭轉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目前西方媒體的報導往往突

出一個論點：在威權體制中，國與國之間有天然的親和力，比如，當土耳其、菲律賓、斯里蘭卡等國家走向威權主義時，中國則乘虛而入，加大投資。這種報導未必客觀公正（印度支持在不公正選舉中產生的哈西娜政府就是明證），但確實已經成為西方媒體報導中的主流。如果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呼籲支持孟國的公正選舉，不但可以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也為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雖然孟國部分人士表示希望中國「干預」其內政，但是中國在2018年孟國選舉上謹慎小心，堅持不干預原則。

不過，在2018年馬來西亞選舉和2022年斐濟選舉時，儘管中國外交官員只是公開表態要保持政治的穩定性，但仍被解讀為中國干預這些國家的內政，遭受質疑和批評，而且結局是兩國都換了政府。中國的「干預」問題已經在實踐中不斷提出來。如何在內外一體的理論下重新思考「干預」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挑戰。在一些傳統「不干預」的領域中，中國已經不得不採取新的、主動的、變相的介入方法，因此中國的「不干預」政策的理論未來需要調整和發展。

## 四 結論

本文探索內外一體視角下國運興亡之新理，討論了一系列問題、規律和原則，旨在完成魏源等近代思想家開啟的內外一體的思想革命。內外一體的新範式為我們重新思考和構建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一個新框架和新視野。中國學者秦亞青所建構的國際關係理論，強調「中國是一個上升的社會主義大國，正在經歷着從〔國際〕體系外國家向體系內國家的轉型」，其成就已經引起國際關係學術界的重視和讚揚<sup>⑨</sup>。通過突出內外關係的研究，有助於深化和發展中國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

首先，內外一體的框架呼籲中國的國學研究或黨建研究必須拓展其視野，從內外一體的角度重新思考有關研究的基本問題。如果國學研究只是注重中國本原性，必將限制了國學對全球性問題的回答，成為內學之說，不能打造為一個內外之學。如果黨建研究從屬國內政治，只注重國內治理，必將失去把黨建研究與世界研究有機結合的機會，從而限制了其學科的發展。可喜的是中國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在內外一體角度上作出了突破性的貢獻。《經濟研究》最近發表了江小涓等人的論文，從高水平分工和制度性開放來討論跨境資源配置，研究視野開闊，顯示了中國學者在全球性問題研究上的開放性和創新性<sup>⑩</sup>。

其次，內外一體的範式為中國政治學研究改革提供了一個新方法，也為我們思考中國政改的方向、內容、原則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前面提到的「隱纏序」就是一個內外一體的視角，有待我們從中去發現中國內外政治的奧秘。但是，僅從國內政治視角是永遠無法打開這道秘密之門的。中國政改不徹底來自國內改革動力不足，內外一體可形成一個新的政改動力。中國作為最大的貿易大國，在內外經貿關係中產生了無數新問題、新壓力，政改是保證其持續發展的一個壓艙石。

最後，內外一體的範式對權力關係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原則：我們必須從網狀關係中重新思考權力之源、權力中心、權力制約、權力運作等問題。內外一體應該有一個統一的原則。內外一體中必須有對權力制約的機制，必須落實權力來自公民這個原則；公民是權力的來源，他們是賦權者。中國政改的方向和標準在於是否解放了公民的政治生命力，是否發揮了公民的政治積極性和創造性，是否尊重公民的平等自由的尊嚴及其公民權。偏離這個方向，必遭遇內外的抵抗。韓非子的權力觀念必須重新清理、揚棄之。政治繼承制度的民主、有序安排，權柄的透明性，社會管理的自主性（非控制性），應該是政改的方向和原則。中國政改的困境和不徹底以及未來的突破與發展，必須在內外一體的框架下重新思考。

### 註釋

① 田野考察記錄如下：孟加拉（2016年4月10至14日）、緬甸（2016年4月、2018年8月和12月）、印尼和馬來西亞（2017年11月16至26日）、泰國（2018年3月）、菲律賓（2018年3月）、越南（2018年6月）、蒙古（2018年10月）、巴基斯坦（2019年2月1至9日）、柬埔寨（2019年8月）、北韓（2019年10月）、南韓（2022年）、斐濟（2023年）。

② Jane K. Leonard,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③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④ 〈習近平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二十大作報告〉（2022年10月16日），共產黨員網，[www.12371.cn/2022/10/16/ART11665901576200482.shtml](http://www.12371.cn/2022/10/16/ART11665901576200482.shtml)。

⑤⑥ 〈習近平說，我們要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23年3月13日），新華網，[www.news.cn/2023-03/13/c\\_1129429229.htm](http://www.news.cn/2023-03/13/c_1129429229.htm)。

⑥ 潘成鑫：〈量子全息理論的本體論新解：以國際關係為例〉，載唐代興主編：《哲學探索》，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頁66-88。

⑦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MA: Longman, 2012), chap. 5.

⑧ Baogang He, "The Domestic Constraints of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Ambition", *IDEES*, no. 52 (May 2021), <https://revistaidees.cat/en/the-domestic-constraints-of-chinas-global-leadership-ambition>; "A Rising China Needs to Demonstrate Moral Courage on Myanmar Issue", *ThinkChina*, 8 March 2021, [www.thinkchina.sg/rising-china-needs-demonstrate-moral-courage-myanmar-issue](http://www.thinkchina.sg/rising-china-needs-demonstrate-moral-courage-myanmar-issue).

⑩ 參見 [www.lowyinstitute.org/key-issues/china-and-pacific](http://www.lowyinstitute.org/key-issues/china-and-pacific)。

⑪ Ted Piccone, "China's Long Game on Human Rights" (24 September 2018), [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9/24/chinas-long-game-on-human-rights](http://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9/24/chinas-long-game-on-human-rights); Baogang He, "China's Roles in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garding North Korea's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Debating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Northeast Asia*, ed. Baogang He, David Hundt, and Chengxin Pan (London: Routledge, 2021), 47-72.

⑫ Richard Maher, "The Elusiv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9, no. 4 (2016): 959-70.

⑬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6 September 2021 on a New EU-China Strategy", [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382\\_EN.html](http://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382_EN.html).

⑭ Hugh White, "Without America: Australia in the New Asia", *Quarterly Essay*, vol. 68 (November 2017): 1-81; "Canberra's Choice: Pivot or Recalibrate?" ,

*The Straits Times*, 28 March 2017, [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canberras-choice-pivot-or-recalibrate](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canberras-choice-pivot-or-recalibrate).

⑮ Alex Oliver, “2017 Lowy Institute Poll” (21 June 2017), [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2017-lowy-institute-poll](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2017-lowy-institute-poll).

⑯ Baogang He, “Biden’s Misguided Framing of US-China Rivalry as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7 December 2021), [www.eastasiaforum.org/2021/12/07/bidens-misguided-framing-of-us-china-rivalry-as-democracy-versus-autocracy/](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21/12/07/bidens-misguided-framing-of-us-china-rivalry-as-democracy-versus-autocracy/).

⑰ Baogang He, “Regionalism as An Instrument for Global Power Contestation: The Case of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44, no. 1 (2020): 79-96.

⑱ 吳士存：〈南海持久和平將不再是奢望〉（2019年11月8日），環球網，<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F33>。

⑲ 〈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發言〉（2016年10月11日），[www.xiangshanforum.org.cn/speech\\_home.html?speechcode=fB28f1780SD5C253](http://www.xiangshanforum.org.cn/speech_home.html?speechcode=fB28f1780SD5C253)。

⑳ Baogang He, “Security Regionalism: A New Form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ed. Huiyun Feng and Kai He (London: Routledge, 2018), 151-69.

㉑ Baogang He, *Contested Ideas of Regionalism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6), chap. 5.

㉒ Jeffrey J. Anderson, “Hard Interests, Soft Power, and Germany’s Changing Role in Europe”, in *Tamed Power: Germany in Europe*, ed. Peter J. Katzenste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49-79.

㉓ 參見 *SouthAsia* 25, no. 11 (2021): 15-30。

㉔ Max Bearak, “Sri Lankan Ex-President’s Vanity Airport Project Grounded by Cash Crunch” (31 March 2015), <http://america.aljazeera.com/articles/2015/3/31/Sri-Lankan-ex-presidents-vanity-airport-project-grounded-by-cash-crunch.html>; Jonathan E. Hillman, “1MDB Probe Shines Uncomfortable Light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Nikkei Asia*, 18 January 2019,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1MDB-probe-shines-uncomfortable-light-on-China-s-Belt-and-Road>.

㉕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中國對外勞務合作發展報告2016-2017〉（內部發行，2017年12月11日），頁10。

㉖ James Kyngge, “China’s Silk Road in Central Asia: Transformative or Exploitative?”, *Financial Times*, 27 April 2016, [www.ft.com/content/55ca031d-3fe3-3555-a878-3bcfa9fd6a98](http://www.ft.com/content/55ca031d-3fe3-3555-a878-3bcfa9fd6a98).

㉗ 〈深山密林間千年古道：馬幫商隊曾密布雲南〉（2014年11月2日），中國新聞網，[www.chinanews.com.cn/cul/2014/11-02/6740737.shtml](http://www.chinanews.com.cn/cul/2014/11-02/6740737.shtml)；楊思靈：〈構建孟中印緬命運共同體〉（2018年6月14日），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昆明）南亞東南亞研究院網，[www.sky.yn.gov.cn/ztzl/zg-nyzkl/zgsd/3795317205642885390](http://www.sky.yn.gov.cn/ztzl/zg-nyzkl/zgsd/3795317205642885390)。

㉘ 〈「一帶一路」十周年：回顧、展望與多邊化發展建議〉（2013年10月8日），「全球化智庫CCG」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cXNzAzOQ==&mid=2247603485&idx=1&sn=1e5877a76112e6a9383c3d2f53b0988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cXNzAzOQ==&mid=2247603485&idx=1&sn=1e5877a76112e6a9383c3d2f53b09889)。

㉙ 參見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頁175-76；Amitave Acharya,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Necessity or Indulgence? Some Reflections”, *Pacific Review* 30, no. 6 (2017): 825-26;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R Theory? T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17, no. 3 (2017): 360。

㉚ 江小涓、孟麗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開放提升跨境資源配置效率〉，《經濟研究》，2023年第8期，頁15-31。